

诗人余秀华：苦痛中的歌唱(2)

◆ 李伟
张兰英

瓷瓶上的两条鱼

我的残疾是被镌刻在瓷瓶上的两条鱼
狭窄的河道里,背道而行
一白一黑的两条鱼
咬不住彼此的尾巴,也咬不住自己的尾巴
(余秀华:《瓷》)

余秀华出生在 1976 年 4 月 5 日,那天是清明节。她开玩笑说:“因此带点鬼气。”

母亲周金香肚子痛了一个星期了,但是孩子始终生不下来。直到 4 月 4 日晚上,剧痛无法忍受,父亲余文海出门去找接生婆。天亮的时候,接生婆到了,是个新手。在她的帮助下,母亲又挣扎了大半天。直到黄昏,余秀华的脚步先出来了,是“倒产”。由于生产时间过长,缺氧造成了余秀华的脑瘫。

周金香说,女儿两岁多的时候还不会坐,他们才发现出了问题。他们把余秀文绑在椅子上,还是坐不好,会直接摔下来。余秀华出生后两年,弟弟出生了。余家终于得到了一个健全的孩子。父母请全生产队的人吃了两天饭,这个举动打破了村庄的习俗。以前生孩子,只请客一天,从余家开始,就变成了两天。

父母带着余秀华去钟祥医院看病,带了一瓶自家榨的香油送给医生。医生告诉他们,这个病不能完全治好,国际上都没有痊愈先例。不过在医生的治疗下,余秀华不流口水了。她后来感谢这位医生:“这对我来说,比走路更重要:一个人流口水,人看见了总是觉得恶心,更不敢亲近了。”

余秀华是个早慧的孩子,她知道自己的身体缺陷,甚至为此带有负罪感。她说,一个卑劣的生命带给世界的的确是伤害。在余秀华的记忆中,童年是灰色的。别的孩子跑来跑去,她则被绑在椅子上不停地抖动。

后来在一个江湖游医的帮助下,用针灸治疗,三四岁的时候,余秀华终于站起来了。虽然她不能走路,但对父母仍是巨大的鼓舞。余文海用一个轴承加几根木棒,做了一辆小

三轮车,类似于现在孩子的学步车。余秀华扶着这辆小车在打谷场上练习走路。她天天迈着蹒跚的步伐。直到一个傍晚,她终于丢开了小车,自己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摇摇晃晃地从打谷场的北面走到了南面。尽管走的不是正常人的姿态,而是倾斜着向前,父母还是笑得眼泪横飞。这时候,她已经 5 岁了。

会走路只是一个好的迹象,但却没有从此就好起来。她摇摇晃晃,一不小心就摔倒。医生还是说治不好。在乡下,求神拜佛是免不了的。余文海便请了“神婆”、“神汉”来看看女儿是怎么回事。

一个“神婆”说她上辈子搞死了一头牛,因而受到惩罚。但做法事,依旧没有任何效果。后来又有个神婆提出了一个更恐怖的说法,说她前生把一个孩子沉到井里去了。尽管都是无稽之谈,但对余秀华的童年却是一个冷暴力。“它让我完全否定了自己,没有了自信。”余秀华说。

求神无效,父母便带着幼小的女儿四处求医。他们去钟祥、荆门、宜昌、武汉,带着希望去,带着失望回。每过一段时间,听说哪家医院好,便背上女儿又出发了,无非是想从医生那里得到一点点光明的慰藉。他们没有钱,只能坐最慢的车,住最差的地方。直到余秀华上初中,他们去了北京的一家大医院,专家告诉他们真的治不好。他们才算死心。

母亲周金香告诉我,因为女儿是残疾,可以再要第三个孩子。但他们还是放弃了,想把更多的精力和不多的钱都留给女儿。

余秀华上学了,那一年 7 岁。她看到别的孩子上学,也要求去。父亲把她背到了村里的学校。“我真就真上学了,命运慢慢展开了画卷,我如一个小丑把鼻梁涂红。”她自己走不了,最初每天都要人背着去上学。读高中的时候住校,父亲骑自行车接送她,单程要 20 公里。

余秀华并不笨,可以说很聪明,记忆力好,但问题在于写字。她的手不停地抖动,而且抖动幅度很厉害。她必须用左手奋力压住

右手,但是笔画弯弯曲曲,老师只能猜测判断。余文海说,那时候女儿很努力地要写好字,用很大的力气控制手,结果把纸都划烂了。她写字用的力气不比干农活用得少,小指和无名指都磨出了血泡,结出了厚厚的茧子。

写字,一直是余秀华读书期间最大的障碍。直到高中辍学后,她才慢慢练习用左手写字。竟然比右手写得好了。她有事后后悔,如果早点想到用左手写字,也许会念到大学,会是另一种不同的命运。在学校,余秀华感到孤独和寂寞。老师看不懂她的字,也改不了她的作业。参与不了别的孩子的游戏。

但学校时光并非总是黯淡的,点滴关怀就能让她感到一辈子的温暖。比如一位姓郑的老师,不仅讲课仔细而且给她许多生活帮助。有一次余秀华上厕所,扎毛裤的松紧带解不开了,她憋得要尿裤子,这时郑老师帮她,用嘴把松紧带咬开。

余家盖房子,请了村里人帮忙。但没想到出了意外事故,摔伤了人。父亲余文海不仅要负责村人住院治疗,还要给他家干活。村人的老婆是个泼辣粗鲁的女人,骂了余文海很久。骂到最后,所有的词用完,便扯到余秀华身上,说她前生没做好事,所以今生走路一摆一摆的,说她父母也没有做好事,才生出了这样一个女儿。那天余秀华在田埂上听到了,心里很难过,想哭但是不能哭。

尽管并非所有人都会歧视余秀华的缺陷,但她却无法躲开异样的目光。身体的缺陷,一直是她心头的疮疤,是她宿命感的根源。在诗里,她始终无法与自己的身体和解。她在诗中绝望地写道:“当我注意到我身体的时候,它已经老了,无力回天了许多部位交换着疼:胃,胳膊,腿,手指我怀疑我在这个世界作恶多端对开过的花朵恶语相向。”(《我以疼痛取悦这个人世》)

余文海告诉我,女儿小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日记:她幻想自己在出生时就死去了,父母嚎啕痛哭,阎王爷看他们可怜,便将她放回了

明星狼



王为民

9.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安德鲁以从未有过的情感和想要表现的欲望,让助手端来小狼们的午餐,一盆盆新鲜的牛肉,亲自一块块地抛向小狼,每抛一块,便喊出一只小狼的名字。

“Cloudy!” Cloudy 腾身跃起,牢牢叼住牛肉。“Parker!” Parker 腾身跃起,牢牢叼住牛肉。安德鲁叫到哪只狼的名字,哪只狼就应声行动,井然有序,丝毫不乱。

姜戎老师一边不住地点头,一边连连称赞,安德鲁不愧是世界顶级的驯狼师,敬业、认真,训练有效!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温暖而美好。

傍晚,夕阳将狼基地染成淡淡的红色。休息区的长桌旁,我、江老板、姜戎老师和安德鲁对坐,心情随着微风荡漾。姜戎老师和刚进狼基地时的严肃不同,完全像变了个人,兴奋地给我们讲述着他年轻时在草原上的往事,我们的思绪也在他的话语声中延伸开去,进入《狼图腾》的世界……

接到电话的时候,我已熬了一个通宵。

整夜的工作,我都在修订与哈尔滨野生动物园关于购买小狼的合同,我们打算今年四月狼崽出生的季节,再从那儿买进五只雄性的小狼崽。电影《狼图腾》中有小狼大狼同时出现,我们需要老中青三代的狼。哈尔滨动物园这次开出了高价码,原因是我们这次只要雄性的和最优质的,这对他们园里的整个狼种群来说都是不小的损失,动物园里狼群的质量也将可能因此大大降低。物以稀为贵,他们的要求也是正当的。

我跟哈尔滨野生动物园磨了很久,价格总是谈不妥,从去年冬天开始,眼看春天已经来了,狼崽都要出生了。最后我只能相对妥协,这次狼崽的价格每只都是去年的三倍,这个费用实在有点儿高。没办法,为了电影!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谁会在清晨打电话呢?来电显示是安德鲁。

“Hello……”我很放松,声音懒洋洋的。

“Max,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出什么事了?我这里天天都是烦心事儿,没有好消息。”我以为他是在调侃我。

“Cloudy 快不行了!你必须马上过来一趟!”安德鲁很严肃,可以听出他呼吸的不均匀。“什么?!”我如同被电击一般,从椅子上跃起,“Cloudy 不行了?!”我基本上忘记了自己是怎么冲下楼,怎么发动汽车,以怎样的速度奔向郊区的狼基地,只记得车窗两边的景物都变成了色块,飞快地从耳边滑过去。

Cloudy 是这批小狼中最出色的,无论是从亲人度还是受驯程度来看,它就是我们都看好的未来的明星狼,而另外 11 只小狼,无一能与它媲美。最重要的是,Cloudy 是我最喜欢的小狼,每当工作太累休息的间隙,闭上眼睛,它可爱的样子总能浮现在脑海中。虽然我没能全程参与训练和饲养,但我对 Cloudy 的感情,绝不输于从早到晚和它在一起的安德鲁!

Cloudy,你绝不能倒下!等着我!

冲进狼基地时,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围在一起沉默着,气氛紧张。我分开人群,看到安德鲁正轻抚着侧躺在地上的 Cloudy,Cloudy 闭着眼睛,四肢瘫软无力,鼓胀的肚子频率缓慢地一起一伏。Cloudy 看到我来了,微微睁开眼睛,眼神暗淡而痛苦。

“到底怎么回事?!好好的怎么变成这样了!?”我瞪大眼睛,咆哮着!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原本每天都精力旺盛、欢快无比的 Cloudy 突然一下就蔫了,它孤独地躺在狼舍里,一副痛苦的样子,肚子胀得有点儿大,不时在地上磨蹭着打几个滚。安德鲁赶来,吹响了平日训练时熟悉的口哨,Cloudy 听到了急促的口哨声,它试图爬起来,但失败了。

Cloudy 的这种状况让安德鲁紧张万分,虽然经历过无数次狼的生老病死,但狼就和人类一样,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谁也不能妄下定论说 Cloudy 到底得了什么病,病情到了什么程度。安德鲁仔细地检查了一下 Cloudy,又叫来了另外一名有兽医经验的加拿大成员,经过一番察看和讨论后,安德鲁通知我。“情况有点复杂,不是我们能解决的,赶紧去医院吧!”安德鲁眉头紧皱,无可奈何地跟我摆摆手。

我和安德鲁抱着 Cloudy 上了车,立刻以百码以上的速度去了郊区一家比较大的动物医院。

26.证监会的职能演变

尉文渊在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不无反思地对笔者说:“我们一直希望通过财政部出面搞一个《国债期货管理办法》,一个统一的全国标准。因为从 1994 年下半年开始,继上海证券交易所后,深圳证券交易所、武汉、天津证券交易中心也开始开办国债期货交易,除此之外,北京商品交易所等 10 家期货交易所也陆续开设了国债期货交易,致使全国在短时期内突然有 14 个交易场所相继推出了国债期货交易。各交易所之间只顾竞争,一味追求市场规模和交易量,放松了风险监控,保证金管理、持仓限额等监控措施形同虚设。”

“由于在国债期货市场占有 80% 的份额,对于 1994 年下半年新出现的诸多问题,上海证交所一直想要采取措施,却因为许多问题都牵涉到全国多家市场的统一监管问题,所以迟迟无法下手。尤其是在起草《办法》的过程中,对于市场发展中间出现的一些需要我们严格管制的问题,就是因为各地的竞争使我们产生了犹豫。因为我们想在《办法》通过后,通过财政部的手来对市场存在的问题进行管制。所以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就只能等待中央统一精神,省得再变。就是由于这内外多种原因,造成 1994 年底到 1995 年初上海证交所国债期货监管的调整上不是很及时。”

没有料到的是,如果没有搞《办法》也就罢了,一直以来财政部国债司就是国债和国债期货实际上的最高监管机构。可 1993 年 11 月国务院明确将期货市场的监管权交给了国务院证券委及其执行机构证监会,尽管当时这还只是针对充满乱象的商品期货市场和对此的治理整顿而作出的组织机构安排,但因此就带来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国债期货市场究竟该由哪个部门来监管?

在这里有必要描述一下证监会的职能演变。从 1990 年上海证交所成立起,有将近 2 年时间,整个证券市场并不存在全国性的证券监管机构。直到 1992 年 10 月,深圳爆发新股发行引发的“8·10”事件(1992 年 8 月 10 日,深圳发售 1992 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引发

中国赌金者

——三七事件始末

陆一



百万人争购,并在此过程中出现舞弊现象而导致社会冲突,由此造成震惊全国的“8·10”事件),才匆匆建立了国务院证券委和证监会。当时明确国务院证券委是国家对证券市场进行统一宏观管理的主管机构,而证监会只是国务院证券委下属的监管执行机构。

在中国,一个新的政府部门设立,就必然要从原来已经划定的权利范围,挤出属于自己的地盘。当时,国务院证券委更像是一个部际联席会议,依附于证券委的证监会更是名不正言不顺。连已经明确的股票市场,两家证券交易所都并不完全买它的账,证监会几次想要出手,却一直无法直接插手沪深两地证交所的人事与业务领导,因为上海和深圳地方政府也未必把尚未完全取得说不二权力的证监会放在眼里。因此直到 1998 年 4 月,国务院将国务院证券委与证监会合并组成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之前,仅作为国务院证券委执行机构的证监会,在权力扩张上无法和其他传统强力部门如人民银行和财政部抗衡,权力扩张能力受到很大限制。

同时,在 1992 年 10 月成立后,证监会的注意力全在应对“8·10”事件后的股票发行制度改革,沉浸在 1993 年额度制引发的上市公司新股发行大潮和初次尝试审批权的快感中;面对市场因新股大量发行而造成的下跌,也让证监会自顾不暇。因此,当时的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多年后回忆道:“我在任期间,忙于股票市场,没有力量研究债券市场。”

直到 1993 年 11 月,国务院明确期货市场由证监会监管,这是证监会成立后第一次把部门权力范围扩大到股票市场之外。尽管如此,对于朱镕基决策创建的上海证交所与传统职能部门财政部共同开设和发展的国债期货市场,直到 1994 年 6 月,证监会还只能是很客气地表示“国债期货交易对我国国库券的发行和流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以进行试点。经证监会商财政部批准后,将选择少数交易所进行国债期货交易试点”。而那时候上海证交所的国债期货市场已经渐成气候,此后全国各地渐次开办国债期货的十几个市场,其实谁都没有去征得证监会的批准。